

目 录

周恩来同志在武汉失陷前后	李金元 (1)
难忘的教诲	周钦岳 (9)
关于“三大”前后的回忆	于树德 (14)
在国民党狱中	张明远 (20)
茅家岭暴动	李维贤 (52)
大革命时期的江华农运	吴健人 (62)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生活	张季任 (82)
我所认识的赵一曼同志	方未艾 (98)
二十年代初期青岛纺织工人	
运动片断	王景瑞 (114)
首次占领延安	白志文 (127)
北欧木屋中	江晴恩遗作 (134)
后记：关于《北欧木屋中》	江柘舟 (150)
反“扫荡”五日记	钱 钧 (152)
赣南追歼战	张兴华 (159)

人 物

陈郁同志在全国海员总工会陈修良 (168)

回忆红九师参谋长胡陈杰烈士

.....徐孔嘉 陈云阁 (178)

陈志正烈士传略.....陈立平 窦止敬 (185)

关于向警予同志的资料

向警予同志被“引渡”内幕於润华 (191)

订正张崇文等 (200)

周恩来同志在武汉失陷前后

李 金 元

一九三八年十月间，日寇从水上和陆地三面包围了武汉，武汉三镇危如累卵。天空每天有飞机盘旋、轰炸，机关、店铺都关了门，人们惶惶不安。国民政府的文武大员们早已南逃，躲进大后方的公馆、别墅里避难去了。可我们的周恩来同志仍然坚持在这里领导武汉人民进行抗日战争。

当时，周恩来同志作为我党的全权代表，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他又是我党南方局书记，领导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还兼任《新华日报》的董事长，工作非常繁重而复杂。在日军逼近武汉的情况下，他临危不惧，经常不眠不休，组织群众撤退，转移和输送党的干部，组织出版由他口授的《暂别武汉》社论的最后一期报纸。一直坚持战斗到武汉失守前几小时。

十月二十二日，日军逼近，日本飞机对武汉也开始连续轮番轰炸，形势已十分紧急。但周恩来同志仍指挥若定，于这天下午亲自组织了我党最后一批同志的撤退，并为同志们送行。这批同志是由李克农和潘梓年同志率领的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馆的工作人员。他们乘坐通过关系租来的轮船“新升隆”号，准备直抵重庆。“新升隆”吨位小，报馆的印刷设备和纸张把底舱塞

满了，一百余人乘船显得很拥挤。这时，岸上几十名无钱购买船票的难民要求搭船。周恩来同志告诉大家，一定要满足同胞们的这个要求，挤也要让他们挤上去。说时，他亲自上船一一清点人数，腾挪位置。安排就绪后，他又给大家讲了话，并和同志们一一握手告别。想到在这样的时刻要离开朝夕相处的首长和同志们，许多同志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新升隆”徐徐开动了，周恩来同志还站在岸上向同志们频频挥手，直到轮船远去。

武汉的形势更加危急了，身边的同志一直催促周恩来同志早一点离开武汉，但他依然那样泰然自若，谈笑风生，总是从容不迫地说：“再等一等。”为了防止万一，八路军办事处从汉口日本租界大石洋行搬到了武昌。二十四日深夜了，周恩来同志又要过江到汉口法租界检查最后一期报纸的出版情况。司机王友许同志把车开到江边，只觉得硝烟味扑鼻而来，原来是敌机扔下一批炸弹后刚刚溜走，还可听到汉口东北面不断传来的隆隆炮声。他想劝周恩来同志不要过江了，以免发生意外，但看到周恩来同志安详的神色，炯炯有神的目光，涌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这天晚上，周恩来同志一直看到报纸抢印完、散发走，并安排报馆几名工作人员动身南撤，他才离开。到二十五日凌晨，大雾笼罩了武汉市，大街上行人绝迹。日寇的炮火已由城外向市区延伸，兵舰也从水上靠近了汉口。这时，同志们都为周恩来同志的危险处境捏着一把汗，但他仍不顾同志们的劝阻，坚持前去武昌黄鹤楼查看他预先布置刷上的日文标语。当他看到“武汉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坟墓”的特大标语，醒目地刷在城墙最高处，没有错字漏字时，显露出了满意的神色。当他和同志们告别武汉，一起驱车南下时，正是二十五日上午九时。到中午时分，日本侵略者的铁蹄

就踏进了武汉三镇。

我们警卫队的几个同志随罗炳辉、张元培、童小鹏等八路军办事处的领导同志先到长沙等候周恩来同志。我们在长沙见到了正在这里工作的叶剑英同志。叶剑英同志马上要去衡阳，临行前，他叮嘱我们说：“长沙局势不稳，‘周公’（同志们对周恩来同志的敬称）到长沙后，不要停留，请他立即去衡阳。”武汉失陷的消息传来，长沙城里城外一片混乱，警报一天叫无数次。前方下来的部队川流不息。国民党湖南当局惶惶不可终日，束手无策。市民见到军人就问：“长沙能守得住吗？”得到的都是令人失望的回答：“那谁知道，守得住，守不住，是上头的事儿。”

周恩来同志离开武汉后，先到了湖北嘉鱼县燕子窝。原来，从武汉开往重庆的“新升隆”号驶至嘉鱼时，遭到日寇飞机轰炸，造成很大伤亡。周恩来同志到后，对遇难人员的善后事宜作了妥善处理，对其余同志重新作了安排。尔后周恩来同志又到湖北的咸宁、蒲圻和湖南临湘等地视察了国民党部队，对前线将士表示慰问。

十一月十日，周恩来同志乘坐他的“雪佛兰”小汽车来到长沙市簸子街八路军办事处。首长安全到来，我们非常高兴，纷纷围上去迎接他。一到，司机王友许同志就给同志们讲述了撤出武汉的惊险情景，大家听了一片啧啧声，个个惊叹不已。周恩来同志面容清瘦，本来就长的胡须似乎又长了许多，但两道浓眉下的目光仍然那样锐利有神。他微笑着向同志们问长问短：“你们安全吗？碰到飞机轰炸没有？”张元培等同志急忙向周恩来同志转达叶剑英同志的嘱托说：“叶剑英同志请你今天就去衡阳。”我们大家也在一旁七嘴八舌地催起来。“不，今天不走，我要住下

来。”他用肯定的口气回答说。我们只好退一步地请首长好好休息休息，工作第二天再谈。可他哪肯休息呀，随便洗了一把脸，喝了两口水，连饭也没有吃，就去视察长沙市的几条主要街道，检查抗战物资转运情况，看望尚在长沙的文化界人士。晚上找办事处的同志谈工作。接待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各界知名人士。他精辟地分析形势，苦口婆心地宣传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关于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为了工作需要，周恩来同志总是让我们多了解情况。因此，他谈情况，讲形势时，工作人员只要有空都在一旁听着。我们这些在周恩来同志身边的同志，都为他那辛勤工作的精神所感染，总有一股子使不完的劲。

第二天，周恩来同志得知中国青年记者协会的部分同志对撤出长沙还有些踌躇。他把同志们找来亲自作了动员说服工作。他对青年记协的同志们说：“日寇占领武汉后，战略和策略可能要改变，内外形势会起变化，现在长沙太乱，张治中将军难以控制局面。克农同志已到桂林，你们还是到那里去工作为好。”对“周公”，不论党内还是党外同志，都是十分信赖的。听了他的话，当天下午六时以前，所有同志都离开了长沙。这一天的晚上，周恩来同志终于休息了。由于连日的奔波，他的司机也够辛苦的。为了第二天旅程安全，我和张元培同志替换司机看车，我们就睡在放在门楼下的汽车里头。大约在十一点的时候，簸子街起了冲天大火。门楼上烧着的木板掉到汽车顶上，把我们砸醒了。起来一看，火光染红了半边天，黑烟滚滚，气浪逼人，近处见两个国民党士兵还在将一桶桶油往火上泼，远处是市民的叫骂声、呼救声，乱成了一团。这就是国民党政府实行的所谓“焦土抗战”政策。我们赶紧把周恩来同志叫醒，由邱南章、张元培等

同志护送他沿湘江出南门。周恩来同志对日寇还远在千里，国民党政府就点起一场无名大火，给人民造成极大灾难的“焦土抗战”，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十一月下旬，周恩来同志出席衡山南岳军事会议后到了衡阳。他立即召集全体办事处干部、工作人员开会，布置任务，安排工作。周恩来同志身着八路军军服，腰间系着皮带，腿上打着绑腿，身材魁伟，眉清目秀，兼有学者风度和军人气质。他将双手操在背后，来回地慢踱步子。分析了一番形势之后，站立在我们面前，先用和悦的目光扫视了大家一遍，然后把那浓浓的双眉稍稍一举，说：“日寇占领武汉之后，兵力转向扫荡其后方，正面战场暂停进攻，同时在政治上对国民党采取诱降政策。我们必须在政治上、军事上采取针对性的战略和策略，击破敌人的阴谋诡计。目前我们的工作任务，就是要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大力开展敌后抗日斗争和做好群众工作。”周恩来同志对形势的精辟分析，给我们指明了斗争的方向。根据他的指示，我们办事处的同志，一部分去衡山做南岳游击训练班的工作。游击训练班是我党和国民党合作举办的，每期三个月，学员四百名，对象都是国民党营、团军官。国民党方面派汤恩伯任教育长，副教育长是叶剑英同志。办事处的干部李涛、边章五、谢子真、吴奚如、涂正坤等同志均担任教官，授课内容有游击战、持久战、运动战等。其余同志组成衡阳交通站，主要任务：一是负责南岳游击训练班的物资保障；二是转送党的地下工作同志；三是接受并转运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为八路军、新四军捐献的各类物品。

周恩来同志将我们的工作安排妥当后，便全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当时他主要是忙于接见《青年日报》、《文汇报》、《中

央日报》等各报记者。他着重回答了对武汉、广州失守后的形势怎么看、抗日战争的前途如何，以及其他为全国军民所瞩目和关心的大问题。周恩来同志指出：从七·七抗战开始，到武汉、广州失守这一阶段，我们取得了相当大的胜利，这就是从战略上击破了日本帝国主义一战而胜中国的企图，使其陷入了长期战争的泥坑。不要以为日军占领了几个大城市，就会象画几何图形一样，可以连点成线，进而发展为面。相反，日寇兵力不够，士气不足，交通不便，他们被我广大地区、广大军民这个“面”所包围。周恩来同志在分析了敌我双方政治、军事、经济、人心向背诸条件后，斩钉截铁地说：“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人民的！最后失败是属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周恩来同志在谈话中，特别指出当时国民党方面存在的投降、分裂、倒退的危险，呼吁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他说：我们一定要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扩大和发展包围敌人的“面”，使全面抗战在持久战中见效。周恩来同志殷切地希望记者们去各友军、去前线，到那里去采访，把抗战将士可歌可泣的事迹报道出去，鼓舞人民，引导人民支援抗战，争取第二阶段新的伟大胜利。对周恩来同志的谈话，除个别坚持反动立场的记者外，都受到巨大教育和鼓舞。周恩来同志用自己耿耿丹心点燃了中原、华南广大地区敌后抗战的连绵烽火。

周恩来同志对同志们的关怀无微不至，可对自己的安全、生活却毫不放在心上。那时，虽然表面上是国共合作抗日，暗地里，国民党蒋介石一刻也没有忘记反共反人民。周恩来同志每到一地，他的“公馆”周围都有特务据点，对周恩来同志的行踪和来访人士进行监视和盯梢，周恩来同志就是在这样复杂险恶的环

境下，机智勇敢，四处奔忙。十一月底，周恩来同志在南岳国民党中央开完会准备返衡阳，他的“雪佛兰”小汽车突然被盗。我们知道是狗特务干的勾当，非常气愤。领导派我到衡阳宪兵队，向他们提出强烈抗议，责成他们查找。他们慑服于周恩来同志的崇高威望，只好乖乖地把小汽车送回给我们。

周恩来同志“安步当车，晚食当肉”，不要一点特殊照顾。在衡阳的日子里，周恩来同志住在常胜路七十三号禹生公寓，八路军办事处设在衡阳冯家祭场，周恩来同志每天步行到办事处去工作。

一九三九年春天，他去新四军军部视察工作，不久，我和张元培同志专程到江西安福接他。我们冒着瓢泼大雨，在泥泞的道路上颠簸了一天，晚上才回到衡阳廖家湾八路军交通站。周恩来同志一下车就先去找炊事员刘彪同志，刘彪从南京到武汉，又从武汉到衡阳，是我们办事处的老炊事员。他看到周恩来同志那样劳累，饮食太差，很心痛，有时做点面条，里面放两个鸡蛋，周恩来同志虽则领情吃下去了，可他还是要责备刘彪同志。这次回来又是怕刘彪来个突然袭击，所以事先去打个招呼，他对刘彪同志亲切和蔼地说：

“不要油大的，做点素菜，随便吃一点就可以了。”这一次他和湖南地下党的同志谈工作，又是三天三夜没休息。每天晚上的夜宵，我们得先问问周恩来同志，他每一次都这样告诉我们：“做点豆子稀饭就行了。”我们坚决照此办理，一盆儿豆子稀饭，外加一碟子或酸或甜的小菜儿。

忆往昔，四十多年的历史过去了，周恩来同志已经离开了人世。但他那为祖国、为民族，不畏艰险，英勇战斗的赤胆忠心，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呕心沥血、无私忘我的崇高精神，永远激励着

我们。我们纪念他，就是要学习他，象他那样工作和生活，为祖国的四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尉国敏 史春保整理）

难忘的教诲

周 钦 岳

一九三八年的春间，我因《新蜀报》社务去汉口。其时蒋介石畏敌如虎，节节败退，日寇正向武汉进逼，形势极为险恶。我探知八路军驻汉办事处地址，秘密往谒周恩来同志。他身着戎装，英姿焕发，立即出见，热情握手，无半字寒暄，就给予指示：“你来得正好！前方军事不利，武汉难保，《新华日报》决定迁重庆出版，你是重庆本地人，又办《新蜀报》，要全力支持……。”他那爽直、谦逊、热情的作风，使我惊悚而喜，断然回答：“一定照办！”接受了周恩来同志的嘱咐。我热切地对他说，国民党反动派长时期来恶毒攻击、诬蔑共产党如何如何，您是共产党的杰出的代表，随时广泛地接触社会人士和群众，要他们亲眼看看共产党人的丰采和英雄气派，大有作用。我另特别介绍胡子昂同志往见，他欣然欢迎。我们立谈了一、二十分钟，紧紧握手告别。

在归途中，我一直心潮澎湃。四十多年来，此种意境，时时回荡于脑海中，日子愈久，愈益生新发芽而铭刻肺腑，指我前路！

一、二日后，周恩来同志亲笔手条介绍汉口办事处周怡同志来谈，继又介绍《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同志来谈，均在警报灯

火管制的黑夜中，都是为了商谈《新华日报》将迁重庆的事。周恩来同志对党的工作如此极端负责、周密细致的特殊作风，我受到深深的教育。

一九三八年冬间，恩来同志冒长沙大火的惊险，辗转劳顿来到重庆，我为恩来同志、董老（必武）、叶帅（剑英）、邓颖超同志和周怡、潘梓年同志等来到重庆，代表《新蜀报》设宴招待，表示敬意。为扩大党对新闻的联系，特邀请了《新民报》社长陈铭德、主笔罗永烈参加作陪（该报从南京迁来不久）。这一直给我留下愉快的印象。

自此以后，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更加横行无忌，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及恩来同志的行动，均受到特务匪徒的严密监视，《新蜀报》也遭到种种压迫、歧视，《新华日报》的处境更无论了。我自己连去郭老（沫若）寓所访谈，都受到国民党中宣部的警告。为了保持内在的关系，我同恩来同志就不见面，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以及《新华日报》编辑部等，我都不去，只同潘梓年、熊瑾玎、吴克坚、章汉夫、石西民等同志在新闻界活动中碰面时暗示意向，中间曲折甚多，不详述了。“两新”相距密迩，业务联系，概由业务部门去办。但有时国民党中宣部喽罗仍造种种借口加以质问，横蛮无耻已极。

国民党反动派从它的中宣部到它的新闻检查机构，在抗日战争的八年中，无休止地打击《新蜀报》，时而由部长叶楚傖出面要派人打进来加以控制，时而由部长张道藩无中生有地加以诬蔑，以至在“青木关”（特务卡子）要扣留我。这帮家伙贼心不死，于皖南事变后的一九四三年，竟唆使潜伏在我印刷厂内的特务分子，伺隙放火，全毁《新蜀报》为避免轰炸临时迁建在化龙

桥的编辑部和印刷厂。在《新蜀报》当时万分困难情景之下，真是一场大灾难！白光荣厂长慑于法西斯淫威，不敢直说，直到解放后，我在上海往访《解放日报》社长范长江时，白任该报印刷厂长，才告以具体情况。

我愤怒已极，于视察现场后，深夜召集全体职工谈话，决心在一个月內全部恢复，继续完整出版（临时请友报代印简版）。经全社职工的艰辛奋斗和有关金融界朋友的大力支持，恢复工作进展甚快，但到最后煞尾阶段差四、五千元，濒临绝境，万分无奈，迫使我商诸潘梓年同志，请求恩来同志的支援。不料，次日即由梓年携来现钞若干（装在跑警报的袋里，当时大都人人如此），并允另以高价买我社闲置的平版机一部（《新蜀报》已改用卷筒机），得以解除急困，真是如天之幸！

“皖南事变”发生一周之后，各报纷纷表态，攻击共产党，《新蜀报》迟无言论表态，罪恶渊藪的“侍从室”两次严令中宣部派新闻处长彭某来社强迫发表社论。我以事关重大，不敢轻率发言，贻误大局，究竟要打日寇，或打共产党，中宣部有明确指示，我就照办。侍从室继再三威逼，我知其毒意所在，始商诸主笔以“相忍为国”为题，写三百字小评，不提事变，刊在不显眼的地位，勉强了事。但他们怀恨更深，终至有最后指使特务夺占《新蜀报》之暴行（一九四五年抗日胜利前夕），扼杀其光荣的生命。

一九四九年五月，我到京，立即简报周恩来同志我住的招待所。两三日后，突有副官来告，“请你稍待，聂总司令将来访你。”不久，聂派车来接我到一小餐馆欢聚，同时晤及杨尚昆同志。

不久，在北京饭店一个厅里，举行一次周恩来同志特别报告

会。董老和各民主党派到京的诸老及同志们参加，约百余人，由林老（伯渠）主持。周恩来同志对国内时局的重要报告，突出提到对未解放区的军事部署以及政治上各方面的初步安排，历时一小时以上，大家听了无比兴奋。周恩来同志站在厅的中心地毯上报告，我们半圆形地围坐几层。我在头排的尾上，正面对着周恩来同志，相距很近，周恩来同志似已看到了我，报告刚一完毕，他便快步向我走来，紧紧握手，并坐下低声告我：“我忙，要荣臻来看你……”我即说：“见到了！”

会后，为了让大家欢快一下，安排了一个简朴的酒会和舞会，有的伴周恩来同志跳舞，有的同周恩来同志碰杯，我在一边走走看看，没有参加什么活动。忽然周恩来同志看见我了，高声招手叫我，我急趋前，把着满盅啤酒，相互高兴地碰杯，我说：“祝你为国辛劳！”相互一饮而尽。

在一九四九年九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夕，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央设宴招待新从外地来京参加会议的同志约二十余人。在入席之前，周恩来同志赶来同大家晤面，我见他逐一和同志们握手的同时，并逐一亲切地告以他的回忆，清晰无误，无不为之惊异动容。

九月中我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后，组织分配我回四川工作，于十月下旬离京，随刘邓大军进军西南。成行之日，周恩来同志曾派人邀我谈话，我因准备行装外出，未能前去。我们一行四人（孙志远、任白戈、天宝和我）搭乘程颂老（潜）专车去汉口，周恩来同志和聂荣臻同志赶来为程老送行。周恩来同志见我在，拉我一边，简切指示：“重庆的《新蜀报》，成都的《新民报》，我和小平同志谈了，他在路上会找你谈的。”到重庆后，我去见小平同

志，他指示说：“适得北京来电，《大公报》总社决定将重庆版交出来。你去同‘重庆大公’负责人进行商谈，拟将《新蜀报》、《大公报》合并，另改报名，人事器材等由组织妥善处理。”后以协议未成作罢。

谁知从此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周恩来同志，一九七六年以后，我们敬爱的总理就离开我们而长逝了！历历情景，竟成了我最后的遗念！

关于“三大”前后的回忆

于 树 德

一九七九年九、十月间，五届政协常委于树德同志在病中回忆了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四年先后参加远东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情况。现在，于树德同志已经去世，为了纪念他，我们特发表这段回忆。

——编 者

参加远东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

我是一九二二年一月去莫斯科参加远东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那时候，我还不是共产党员。我是以天津“新中学会”代表的身份去参加这次会议的。当时人们称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穷党”，听说十月革命以后，苏俄变化很大，我很想知道一些俄国的情况，希望借此机会能到莫斯科去看一看。

当时我是天津法政学校的教员。是李大钊同志通知我去参加这次会的，和我一道走的还有唐山的工人邓培。我们从天津乘火车先到了沈阳，住在朋友开的一个旅馆里，然后到哈尔滨，再到满洲里。那时天气非常冷，在满洲里有专门接待我们的人，用爬犁把我们拉到俄国境内一个叫十八里站的地方。从满洲里到十八

里站是中俄两国不驻兵的中间地带，只有苏联警察看守，在那里停着一列火车，等参加大会的代表到齐后，列车才开走。

在十八里站候车的时候，我们就住在破旧的车厢里。有一天，张国焘把我找去。他是共产党的代表，住的地方比较讲究，是客车的包厢，里面有沙发、写字台、软床，显得很阔气。当时他还是学生，我是教书的，我觉得学生应该尊敬先生，因此走进去一看就有气。他张口就问我信仰什么主义？我一听更烦了，心想为什么一定要问我信什么主义呢？就故意回答他说：我信无政府主义。后来我才明白，原来张国焘认为这次会议是共产党的会议，他曲解了列宁关于这是一次民族会议的本意，他想阻止我去参加这次大会，对我不信任。

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从国内去的有十七、八个人，还有一部分是在莫斯科学习的人。我能记起来的代表有：唐山的邓培；山东的有王尽美、邓恩铭、王乐平，还有一个姓王的，后来当了特务，名字记不起来了；安徽的有几个人，名字记不起了；广东的有两个工人；湖南的有王光辉；无政府主义者有黄凌霜，还有黄璧魂，是个小脚，代表中唯一的女性；共产党代表是张国焘；国民党代表是张秋白。孙中山曾发给张秋白一个证书，但他最初不暴露身份，而是以记者的面目出现。还有贺衷寒、俞秀松、瞿秋白等。瞿秋白当时在莫斯科，他一方面负责接待我们，一方面给代表团做翻译。

参加大会的，除了中国代表团以外，还有日本、朝鲜、蒙古等国的代表，南洋只去了一个印度尼西亚代表。

在会议进行讨论时，我就中国的经济问题作了一个发言，内容是根据《帝国主义侵华史》这本书中讲的一段庚子赔款的历